

26. 姚榮松〈閩南話書面語的漢字規範〉《教學與研究》12期，台師大文學院，1990。
27. 姚榮松〈兩岸閩南話詞典對方言本字認定的差異〉《國文學報》，22期，台灣師大，1993。
28. 姚榮松〈閩客共有詞匯中的同源問題〉第五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1997:2 泉州。
29. 詹伯慧〈關於閩方言研究的幾點思考〉《中國語文研究》第十一期，1995。香港中文大學。
30. 許成章〈試解「台語有音無字」之結〉《大陸雜誌》92卷5期，1996年5月。

## 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

王文顏

政治大學中文系

### 一、前言

連雅堂先生生於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卒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享年五十九歲。在連先生的一生當中，他始終以維護臺灣漢文化為職志，而積極參與詩社活動，正是他維護臺灣漢文化於不墜的重要手段之一；連先生在文章中一再強調說：「文運之存，賴此一線」<sup>1</sup>、「文運之延，賴此一線」<sup>2</sup>，又說：「三十年來，漢學衰頹，至今已極，使非各吟社為之維持，則已不堪設想」<sup>3</sup>，由此可見連先生對於詩社的重視，以及他熱中參與詩社活動的深意。

「報社」是連雅堂先生的職業舞台，「詩社」是連雅堂先生的生活重心，兩者相輔相成，都對連先生的文化工作起著奠定基礎的重要作用。本

<sup>1</sup> 見《臺灣詩薈》九號〈櫟社第一集序〉，該文《雅堂文集》作〈櫟社同人集序〉。

<sup>2</sup> 見《臺灣詩薈》第二號連雅堂〈臺灣詩社記〉，又見《臺灣詩薈》第四號〈臺灣詩社大會記〉。

<sup>3</sup> 見《臺灣詩薈》第二十二號〈餘墨〉。

文選擇〈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做為論題，一則是想將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事跡敘述清楚，再則是想探討連雅堂先生鼓吹詩社活動的深層目的；或許從中我們也可以體會一位文化工作者，在異族殖民統治之下，如何辛苦的維繫漢文化的香火。

## 二、創立或入盟詩社

想要了解連雅堂先生一生參與詩社活動的梗概，從他的居住所在地切入，不失為方便手段；臺南是他生長的地方，居住臺南之時，他與友人創立浪吟詩社和南社，而這兩個詩社便是他聯吟酬唱的根據地；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先生三十一歲，任職於臺灣新聞報漢文部，舉家移居臺中，開始納交於樂社成員，相從甚密，次年，乃應林朝崧先生之邀請，入盟樂社，與中部的詩社中人吟詠甚歡；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先生四十二歲，是年，先生應華南銀行發起人林熊徵之聘，擔任秘書工作，負責處理南洋華僑股東事宜，先生乃遷居臺北大稻埕，開始與臺北瀛社諸君子交往，詩酒酬唱，十分愉快；越四年（即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林景仁創立臺北鐘社，先生亦入盟其中，後來留下許多珍貴的作品，連載於先生所發行的《臺灣詩薈》之中。以上所述是連雅堂先生創立或入盟詩社的梗概，連先生在《臺灣詩薈》第二號（民國十三年三月出刊）中刊登一篇〈臺灣詩社記〉，文中有許多他自己參與詩社活動的記錄，下文擬以之為基礎，並參酌其他相關資料，仔細論述連先生的詩社活動史實。

### 1. 浪吟詩社

浪吟詩社是連雅堂先生與友人所創立的第一個詩社，先生於〈臺灣詩社記〉一文中云：

乙未（一八九五）之歲，余年十八，奉諱家居，手寫少陵全集，始稍稍學詩，以述其家國淒涼之感。當是時，戎馬倥傯，四郊多警，搢紳避地，巷無居人，而葉應祥、陳瘦痕輒相過訪，至則出詩相示，顧不審其

優劣也。越二年（一八九七），余歸自滬上，鄉人士之為詩者漸多，而應祥忽沒，乃與瘦痕、吳楓橋、張秋濃、李少青等，結浪吟詩社，凡十人；月必數會，會則賦詩，春秋佳日，復集於城外之古刹，凡竹溪、法華、海會諸寺，靡不有浪吟詩社之墨瀋，朋簪之樂，無過於斯。乃不十數年，相繼徂謝，今其存者，唯余與蔡老迂而已，回首前塵，寧無悲痛。

在這一則資料之中傳達了幾項訊息，其一，浪吟詩社成立的時間，是在「乙未之歲」（一八九五）的「越二年」（一八九七），也就是光緒二十三年，日本據臺後第三年，連雅堂先生二十歲；其二，浪吟詩社的創立者「凡十人」，包括連雅堂先生與其好友陳瘦痕、吳楓橋、張秋濃、李少青等<sup>4</sup>；其三，由「月必數會」及「春秋佳日，復集於城外之古刹」，可見浪吟詩社的活動十分頻繁。按「乙未之歲」（一八九五）正是臺灣割讓給日本的年頭，先生在此時「手寫少陵全集」，其用意至為明顯，杜甫愛國憂民，社會寫實的詩風，正是先生此時急於想學習的，兩年後，先生即與友人創立浪吟詩社，其用意應該是前後一致的；又據後文我們得悉浪吟詩社結束於「丙午年冬」（一九〇六），因此浪吟詩社前後大概維持十年左右。

### 2. 南社

南社是連雅堂先生繼浪吟詩社之後，聯合友人所創立的第二個詩社，先生於〈臺灣詩社記〉一文中云：

4 十人之中，姓名可考者，除文所提五人外，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又增加曾復生、蘇捷稊、蔡維潛等三人；年譜中亦對浪吟社的創立者與創立時間，提出兩種異說：「賴子清先生撰」古今臺灣詩文社（一），謂浪吟詩社係光緒二十二年，許南英歸里後，邀蔡國琳等所組織者。而謝籟軒詩集所載胡鏡釗先生撰懷念籟軒翁，則云浪吟詩社係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為紀念臺南失守週年而組織者，且社名作婉創浪吟詩社，皆不知何所據，並存待考。」可一並參考。

始丙午冬（一九〇六），余以社友零落（按指浪吟詩社），復謀振起，乃與瘦痕邀趙雲石、謝籟軒、鄒小奇、楊宜綠等，改創南社，凡十餘人；迨己酉間（一九〇九），入社者多至數十，奉蔡玉屏先生為長，嗣玉屏逝，改奉雲石；辛亥春（一九一一），開大會於兩廣會館，全臺之士至者百人，鯤身鹿耳間，聞風而起者，以百數，斐亭鐘聲，今繼響矣。

由以上引文可知，南社成立的時間，是在「丙午冬」（一九〇六），上距浪吟詩社成立的時間，已有九年，此時連雅堂先生二十九歲；南社的創立動機，是因為浪吟詩社的「社友零落」，為了「復謀振起」，所以「改創南社」，可見兩者之間有其關連性；又由「入社者多至數十」、「聞風而起者，以百數」及「開大會於兩廣會館」，可見南社的發展順利，在臺南地區曾經造成一股風潮，而且與全臺詩社互通聲氣，奠定其在南部詩社中執牛耳的地位。

南社成立後不久，連雅堂先生即遷居臺中（按遷居時間為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任職於臺灣新聞報漢文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又遷居臺北，但連先生卻始終忘懷不了南社的社友，連先生於《臺灣詩薈》第十四號〈餘墨〉中為文云：

全臺詩社第二回大會，以本月（民國十四年二月、一九二五）七日開於臺南，辱承寵招，而余羈旅稻江，杜門卻掃，不獲一歸故里，得從諸君子後，自呼負負。

按此文之寫作，上距南社之創立，已有二十年之久，而連先生卻以不得出席南社主辦之全臺聯吟大會而深表惋惜，其關懷南社，惦念昔日詩友之深情，完全表露無餘。

連雅堂先生在南社之時，任職於臺南新報漢文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先生曾在該報發表〈臺灣詩界革新論〉一文<sup>5</sup>，極力反對擊鉢吟，當時臺中臺灣新聞報記者陳枕山及臺中樂社成員群起攻之，筆戰旬日，驚動騷壇，後經樂社大老林癡仙調解，事遂平息。

<sup>5</sup> 該文已佚，先生於《臺灣詩薈》第一十九號〈餘墨〉之中，曾追憶其事。

### 3. 樂社

樂社是連雅堂先生遷居臺中之後，應樂社耆宿林癡仙之邀而入盟該社，先生於〈臺灣詩社記〉一文中云：

樂社為臺中詩人薈萃之所，林癡仙之所倡也。先是戊己之際，苑裡蔡啓運、鹿津陳槐庭合設鹿苑吟社，時以郵筒相唱和，及癡仙歸自晉江，倡樂社，賴紹堯、林南強聞其志而贊之，啓運、槐庭與呂厚庵、傅鶴亭、陳滄玉和之，遂訂社章，立題名錄，為春秋之會，和者浸眾。己酉（一九〇九），余居大墩，癡仙邀入社，得與諸君子晉接，以道義文章相切劘。顧自設社以來，二十有二載矣，癡仙、紹堯、厚庵、啓運、滄玉，雖前後徂謝，而林灌園繼起，鶴亭、南強、槐庭俱健在，建碑刊集，以紹癡仙之志，樂社之興，猶未艾也。

又先生於〈樂社同人集序〉<sup>6</sup>一文中云：

先是戊戌之歲（一八九八），林子癡仙始倡是社，和者十數人；越七載，余居大墩，邀入社。

按樂社創立的年代，及連先生入盟該社的時間，連先生在文章中所載，略有出入，當據《樂社沿革志略》為準，該書以編年為體，舉凡該社之活動，社員之入盟，均有詳細記載，其記載樂社之成立云：「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霧峰林癡仙（俊堂）、林南強（幼春）、燕霧大莊賴悔之（紹堯），三子始結詩社，名之曰樂。」又記連先生入盟的時間云：「清宣統元年（己酉），臺南連雅堂（橫）加盟為社友。」按連先生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遷居臺中，借住於林資鑣先生位於東大墩之瑞軒，與四方名士往來頻繁，尤其與樂社詩友過從最密，次年即應林癡仙之邀而入盟樂社。

連雅堂先生在入盟樂社之前，與樂社詩友曾經有過筆戰（見前文），

<sup>6</sup> 該文見《雅堂文集》。

其退社亦不甚愉快，據《櫟社沿革志略》記載，先生於庚午年（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被迫自櫟社成員中除名，事件經過是這樣：該社理事於三月十三日（古曆二月十四日）集會於霧峰林南強之會客室，決議：「社友中不出席本會總會超過三回以上者，應照社則看做退社。」同年四月二日於林灌園府第招開春季總會，會中「就本年三月十三日理事會議決之社友前後八年（按前文作三年）不出席於總會應照社則第二十四條看做退社一事，質之於衆，滿場一致無異議，照原案可決。」「次有提議某社友亦多年不出席，應照社則看做退社者，一時議論紛紛，結果用無計名投票以定可否，因贊成原案者得大多數，不贊成者二票而已，遂決定認為退社。」按文中所稱「某社友」其實是指連雅堂先生，原先理事會的決議「三年不出席總會，視為退社」，可能只是針對一般社員，至於連雅堂先生，因其在當時臺灣文壇上有特殊地位，故而被當做特別案例處理；鄭喜夫在《連雅堂先生年譜》中評論此事件云：「按先生已八年未出席櫟社總會，故理事會此項決議，無異針對先生而為者；推原其故，亦屬臺灣阿片特許問題一文之反響也。」按先生於該年三月二日於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發表〈臺灣阿片特許問題〉一文，曾引起全臺輿論譁然，先生成為衆矢之的；此事件始末因非本論文討論範圍，故略之。

#### 4. 瀛社

瀛社詩友是連雅堂先生遷居臺北之後所納交聯吟的主要對象，先生於〈臺灣詩社記〉一文中云：

臺北為全臺首府，而瀛社為之主。改革後，陳淑程、黃植亭等，曾設玉山吟社，開會於龍山寺，未幾而息；迨丁未春（一九〇七），洪逸雅、謝雪漁、倪希祖等，乃創瀛社，社員幾及百人，復與新竹之竹社，桃園之桃社，互相聯合，時開大會，多士濟濟，集於一堂，可謂盛矣。余自己未（一九一九）移家淡北，納交於瀛社諸君子，文字之歡，有逾疇昔。

按先生與瀛社諸君子交往，是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其移居臺北之

後，先生是否入盟瀛社，因無史料可徵，故而難以斷定，不過從引文「納交於瀛社諸君子，文字之歡，有逾疇昔」，及其與瀛社大老顏雲年吟詠酬唱等事跡推測，先生縱使未入盟瀛社，但其關係顯然非常密切；又先生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刊行《臺灣詩薈》，其創刊動機就是產生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瀛社招開全臺詩社聯吟大會之時（詳見後文）。

#### 5. 臺北鐘社

有關臺北鐘社的來歷，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云：

秋（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林景仁歸臺，在臺北與里閩相善者作文字飲，間日有詩鐘之聚，遂設臺北鐘社；旋林伯壽返自香港，林熊祥歸自上海，而莊棣蔭、蘇鏡潭、王貽瑄三人復至自閩省，鐘會益盛焉。……

冬（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歲闌多閒，先生（按指連雅堂）與謝汝銓、魏清德、黃贊鈞、劉育英、羅秀惠、劉克明、張漢、林馨蘭等，陸續參加臺北鐘社之鐘會；按絃拭徽，量敵選對，雅音瀏亮，迭互鋒起，諸格悉備，計百數十題，數百十聯；林景仁乃取而芟汰，分門別類，輯而藏之，題曰〈東海鐘聲〉；蓋以莊烏越聲，備異日內渡，攜示菽莊吟社社友<sup>7</sup>；後連載於《臺灣詩薈》。

又連雅堂先生於《臺灣詩薈》第一號〈騷壇紀事〉（刊行於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五日）云：

鐘社（臺北）自客冬創社以來，每逢星期及星期三五，相約小集，各作詩鐘二三唱，分選甲乙，而本年元日，會於季丞寓樓，拈韻賦詩，自是隔日一集，佳作如林，斐亭鐘聲，今繼響矣！

經由以上引文，我們知道臺北鐘社創立於民國十二年秋季，當時只是

<sup>7</sup> 菽莊吟社是林爾嘉與施士洁、許南英等人所創立的詩社，光緒二十一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日人據臺，他們均內渡廈門鼓浪嶼而創立該社；林爾嘉為林景仁之父親，板橋林家後人。

三五人的小集，以林景仁爲首，入冬以後，連雅堂先生與其他友人陸續加入，鐘社規模始擴大，而且佳作如林；翌年，連雅堂先生刊行《臺灣詩薈》，乃要求林景仁將該社作品整理，以〈東海鐘聲〉爲題，連載八期，其中收錄許多雅堂先生的作品，由此可見先生出席該社活動十分踴躍。

### 三、對詩社活動的鼓吹

#### 1. 熱心參加詩社活動

連雅堂先生在臺南、臺中、臺北之時，除了積極參與其所創立或入盟的詩社之外，亦熱烈響應其他詩社的活動：

庚戌（一九一〇）八月十五日，嘉義羅山吟社招開成立大會，先生與南社成員趙鐘麒、謝石秋等與會，會後攝影留念。<sup>8</sup>

己未（一九一九）十月，第一次瀛桃竹三社聯合擊鉢吟會在基隆陋園舉行，先生與會，被推爲第一唱富貴花之左詞宗，及第二唱漁笛之唯一詞宗；是會先生有漁笛擬作，及陋園即事贈主人顏雲年五古。<sup>9</sup>

甲子（一九二四）七月，《臺灣詩薈》第六號正式發行，〈騷壇紀事〉欄中記載，高雄旗山美友吟社以「春興七律」爲社課，並將六十首作品函託先生評選。

庚午年（一九三〇）十月，桃園桃園吟社周石輝與大甲蘆吟社杜香國、

<sup>8</sup> 見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按《臺灣詩薈》第二十號〈花叢迴顧錄〉云：「戊申（一九〇八）仲秋，余赴羅山詩社之會」，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則據盧嘉興先生撰〈清末遺儒臺南謝氏昆仲文武秀才〉一文考訂云：「戊申（一九〇八）爲庚戌（一九一〇）之誤無疑。」

<sup>9</sup> 見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

宜蘭登瀛吟社盧纘祥等創刊詩報，延請先生等十八人爲顧問，而林嵩壽等二十二人爲贊助員。<sup>10</sup>

以上所引資料雖然不多，但可看出連雅堂先生對詩社活動的鼓吹，十分賣力，或出席他社的詩會活動，或擔任詩社活動的詞宗，或爲他社評選作品，而且還擔任詩報的顧問，其多樣性的活動內容，正體現了連先生的熱誠。

#### 2. 刊登詩社活動消息及作品

連雅堂先生在臺南時，主持臺南新報漢文部，在臺中時，主持臺灣新聞報漢文部，在臺北時，毅然發行《臺灣詩薈》月刊；其主持漢文部之時，有否藉之鼓吹詩社活動，不得詳知，但從前文所引他發表〈臺灣詩界革新論〉，因而引發旬日筆戰的往事看來，連先生藉新聞報刊以鼓吹詩社活動的行爲，由來已久；又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先生五十三歲，當其返回臺南故鄉時，曾於三六九小報刊登一則啓事云：「不佞歸鄉之時，曾承南報社長囑主詩壇，自分學殖空疏，得與諸君子唱酬，實爲欣慰；然不佞因撰《臺灣語典》，急於殺青，朝夕研求，無暇及此，經已辭退，而各地吟侶猶時以佳作惠寄，自當登諸三六九小報，以酬嘉貺，肅此布聞，諸維亮鑒。」（本文登於三六九小報第一百三十六號，引文見於《連雅堂先生集外集》）由此可見，連先生到晚年猶念茲在茲，欲將「吟侶」的作品刊登報上；而《臺灣詩薈》的刊行，最可看出連先生藉媒體以鼓吹詩社活動的用心；有關《臺灣詩薈》的刊行緣起，據《臺灣詩薈》第四號〈臺灣詩社大會記〉一文云：

曩年，瀛社大會時（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九二一），連雅堂氏曾以聯合全臺詩社之議，商諸顏雲年氏，并擬刊行雜誌，藉作鼓吹，蓋以今日之臺灣，漢學式微，群德淪落，文運之延，賴此一線，自非糾集多士，互相勉勵，不足補弊起衰。雲年深韙其說，而顧慮經費，不敢舉

<sup>10</sup> 見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

行，其議遂止。

由引文可知，連雅堂先生早有「聯合全臺詩社」、「刊行雜誌，藉作鼓吹」的構想，而其刊行雜誌的目的，在於「糾集多士，延續漢學」；雖然當時因經費困難而作罷，但事隔不久之後，連先生終於實現他的願望，於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五日發行《臺灣詩薈》第一號。

《臺灣詩薈》是以「臺灣詩」為主體的月刊，其版面安排與詩社活動直接關連者，大約有三方面：刊登全臺詩社活動消息、徵求詩鐘或詩作、刊登詩社成員作品，茲分別論述如下：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二月十五日，《臺灣詩薈》第一號正式發行，其中刊登連先生〈致臺灣各詩社書〉一則，全文云：

臺灣各詩社惠鑒：臺灣詩學，於今為盛，文運之延，賴此一線，而眷顧前途，且欣且戚，爰是發刊詩薈，藉資鼓吹，扶弊起衰，詎無小補？然獨力難勝，深虞隕越，所望時賜教言，俾匡不逮。而本報亦特闢詩訊一欄，互通聲氣，如有徵詩及擊鉢吟，并祈抄示，以備刊登，傳之藝苑，不勝禱盼！連雅堂敬啟。

連先生長期從事報社工作，因此他將「互通聲氣」視為鼓吹詩社的重要手段，見解極為正確而先進，在《臺灣詩薈》第一號至第十一號之中，均安排有〈騷壇紀事〉一欄，將全臺各詩社活動的重要消息，刊登其中；可惜第十二號以後，不知何原故，此欄即未曾再見。

徵求詩鐘或詩作，也是《臺灣詩薈》鼓吹詩社活動的方法之一，對於入選的佳作，除了給予獎品之外，並且擇優刊登，如此則帶有比賽性質，對於新手，應該有不錯的激勵作用；在《臺灣詩薈》的〈騷壇紀事〉欄中，即有許多全臺詩社徵詩的消息，可見此種方法當時常被使用，而在《臺灣詩薈》之中，即有四則署名《臺灣詩薈》的徵詩廣告，茲將全文原貌引錄如下，以供參考：

其一，見於《臺灣詩薈》第四號者：

徵求詩鐘 （臺灣詩薈）

- 一. 劍潭夜光 碎錦格
- 一. 限至五月廿五日截收
- 一. 選取佳作擬載第五號詩薈
- 一. 惠稿請示住所姓名，以便發送贈品

其二，見於《臺灣詩薈》第九號者：

徵求詩鐘 （臺灣詩薈）

- 一. 眼字：一剪梅 鼎足格
- 一. 限至十月廿五日截收
- 一. 選取佳作擬載於明年元旦詩薈
- 一. 惠稿請示住所姓名，以便發送贈品

其三，見於《臺灣詩薈》第十二號者：

徵詩 （第一回） 臺灣詩薈

- 一. 題目：稻江冶春詞 七絕 不限韻 每卷最少四首
- 一. 期限：十四年一月三十日
- 一. 揭曉：擬登詩薈第十五號
- 一. 通訊：惠稿如用別號，祈將居處通知

其四，見於《臺灣詩薈》第十七號者：

徵求詩鐘 （臺灣詩薈）

- 一. 題目：蝴蝶蘭合詠格，嵌「春」字
- 一. 期限：五月三十日截止
- 一. 揭曉：登載第十八號詩薈
- 一. 通信：投卷之時請寫住所姓名

以上徵稿所得之入選佳作，均依約刊登於《臺灣詩薈》，例如「劍潭

夜光·碎錦格」選取正取三十名，刊登於《臺灣詩薈》第五號；「一剪梅·鼎足格」選取二十九名，刊登於《臺灣詩薈》第十二號；「稻江治春詞」選取十名四十首，刊登於《臺灣詩薈》第十五號；「蝴蝶蘭·合詠格」選取十二名，刊登於《臺灣詩薈》第十九號；雖然刊登的期別與徵稿偶有出入，但並無大礙。連雅堂先生對於徵詩活動，曾明白宣示云：「徵詩，雅事也，而慕虛名；作詩，樂趣也，而干贈品；市道相交，旁人齒冷，報章所載，嘖有煩言，詩學之興，豈若是耶？」<sup>11</sup>可見連先生是將此事視為「雅事」、「樂趣」，目的在激發「詩學之興」，如果存有「慕虛名」、「干贈品」的想法，都應該被鄙棄。

在《臺灣詩薈》的版面之中，連先生專門安排兩欄刊登「詩作」，其一：〈詩存〉，以登錄臺灣先賢詩作為主；其二：〈詩鈔〉，以登錄當時臺灣名家詩作為主；兩者都極具文獻價值。其中〈詩鈔〉欄是每期的頭版，連先生對此欄的重視，於此可見一斑，當中即登錄許多詩社中人的作品，其鼓舞詩社中人的用意，至為明顯；又前文所舉〈東海鐘聲〉一例，亦為連先生保存、刊登詩社中人作品之明証。

#### 四、對詩社活動的評價

##### 1. 肯定詩社的時代意義

連雅堂先生身處日本殖民統治時代，臺灣漢文化之傳播，深受日本皇民化政策的鉗制，一九一九年日本政府公布「臺灣教育令」，全力施行殖民地同化政策，此後，臺灣的漢文化幾乎沒有發展的空間；而詩社活動是被允許的，許多漢學根柢深厚的日本文士，或駐臺官員，他們也熱中於吟詠詩歌，甚至還糾集同好，自行籌組詩社，吟詠無間，例如玉山吟社、淡社、穆如吟社、南雅詩社等，就是以日本人為骨幹而成立的詩社；由於有這樣的特殊背景，因此日據時代的臺灣詩社格外發達，數量之多，遠超過

<sup>11</sup> 見《臺灣詩薈》第五號〈餘墨〉。

其他各時代；日本人藉此懷柔臺籍人士，臺籍人士則藉此延續漢文化；林南強先生於〈櫟社題名碑記〉一文中云：「世變以來（按指乙未割臺），山澤匪儒，計無復之，遂相率而遊乎酒，人逃於蓮社，有一倡者，眾輒和之，迄於今，島之中社之有聞者以十數，嗚呼！是亦風雅之林，民俗盛衰之所繫也，可不慎歟！」<sup>12</sup>林先生處身於淪陷之時，只能含蓄的說詩社具有「風雅之林」、「民俗盛衰」的時代意義，其實「漢家文化」、「民族精神」才是他真正想說的，由「可不慎歟」一句，我們不難體會其語重心長的沉重心情。

連雅堂先生是一位富於民族精神的臺籍人士，乙未（一八九五）割臺之時，「年十八，奉諱家居，手寫少陵全集，始稍稍學詩，以述其家國淒涼之感。」<sup>13</sup>從此之後，「詩」即成為他抒發情懷的主要工具，兩年後，他與友人創立浪吟詩社，就此開啓他數十年連續不斷的詩社活動，不論居住在臺南，在臺中，或在臺北，他都是當地詩社活動中的健將；連先生之所以如此熱中於詩社活動，理由無他，就是他肯定詩社具有特殊的時代價值；此種理念，深植於心，始終不變，因此在他的文章之中，也一再強調此點，茲將其重要者列舉如下：

顧念海桑以後，吟社之設，先後而出，今其存者六十有六，文運之延，賴此一線，是亦民俗盛衰之所繫也。（見《臺灣詩薈》第二號連雅堂〈臺灣詩社記〉）

讀者諸君惠鑒：鄙人發刊詩薈，原非營業之計，良以臺灣今日之漢文，廢墜已極，非藉高尚之文字，鼓舞活潑之精神，民族前途，何堪設想；然印費浩大，獨力難支，提筆踟躕，不勝憂慮，諸君為臺灣計，為漢文計，如承定購之時，祈將報資先為惠下，俾得周轉，以免滯停，豈為鄙人之幸，臺灣民族之文明亦有賴焉。雅堂敬啟。（見《臺灣詩薈》第三號）

曩年，瀛社大會時，連雅堂氏曾以聯合全臺詩社之議，商諸顏雲年氏，并擬刊行雜誌，藉作鼓吹，蓋以今日之臺灣，漢學式微，群德淪

<sup>12</sup> 見《臺灣詩薈》第一號。

<sup>13</sup> 見《臺灣詩社記》。

落，文運之延，賴此一線，自非糾集多士，互相勉勵，不足補弊起衰。雲年深躋其說，而顧慮經費，不敢舉行，其議遂止。（見《臺灣詩薈》第四號〈臺灣詩社大會記〉）

不佞之刊詩薈，厥有二義，一以振興現代之文學，一以保存舊時之遺書；夫知古而不知今，不可也，知今而不知古，亦不可也；故學術尚新，文章尚舊，採其長而棄其短，芟其蕪而揚其芬，而後詩中之精神乃能發現。（見《臺灣詩薈》第五號〈餘墨〉）

海桑以後，士之不得志於時者，競逃於詩，以寫其侘傺無聊之感，一倡百和，南北並起，其奔走而疏附者，社以十數；而我櫟社屹立其間，左縈右拂，蜚聲騷壇，文運之存，賴此一線，人物之蔚，炳於一時，詩雖無用，而亦有用之日。（見《臺灣詩薈》九號〈櫟社第一集序〉，《雅堂文集》作〈櫟社同人集序〉）

臺灣文化，今消沉矣，振興之策，雖有各種，而發皇詩教，鼓吹詩風，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則詩薈之責任，而不佞所欲就教於邦人諸友也。（見《臺灣詩薈》第十二號〈餘墨〉）

三十年來，漢學衰頹，至今已極，使非各吟社爲之維持，則已不堪設想，唯各吟社之提倡，注重乎詩，夫詩爲文學之一，苟欲作詩，必須讀書，如乘此時而提倡之，使人人皆知讀書之要，漢學之興，可以豫卜。（見《臺灣詩薈》第二十二號〈餘墨〉）

以上引文均出自《臺灣詩薈》，而連先生發行《臺灣詩薈》之時，正是他四十七、八歲之時，他的代表作《臺灣通史》、《臺灣詩乘》等，亦已完稿多時，因此引文之中所體現的理念，正代表連先生最成熟、最肯定的思想；連先生希望透過詩社活動以發皇詩教，而發皇詩教的目的，並非僅僅止於學會作詩而已，所謂「詩爲文學之一，苟欲作詩，必須讀書，如乘此時而提倡之，使人人皆知讀書之要，漢學之興，可以豫卜。」可見「鼓舞人人讀書」和「復興漢學」，才是連先生的終極目標；作爲一位淪陷於殖民地的讀書人，這樣的想法，應該是最根本而透澈的。

## 2. 對創作擊鉢吟與詩鐘的態度

擊鉢吟與詩鐘是詩社從事創作活動的兩種主要項目，連雅堂先生雖然完全肯定詩社的時代價值，但對詩社的創作活動，卻持保留態度，其中創作詩鐘是連先生肯定而鼓勵的，他於《臺灣詩薈》第二號〈餘墨〉中云：

詩鐘亦一種遊戲，然十四字中，變化無窮，而用字構思，遣辭運典，須費經營，非如擊鉢吟之七絕，可以信手拈來也；余謂作詩，先學詩鐘，較有根底，將來如作七律，亦易對耦，且能工整。

詩鐘是一種作「七言對子」的文字遊戲，必須講究平仄對偶，還有限題嵌字等規定，總共有二三十種格式，比起七律中的二三聯，嚴格許多，連先生認爲詩鐘作得好，對將來學作七律時，有很大的助益，因此給予肯定；至於創作擊鉢吟，連先生則批評多而鼓勵少，他於《臺灣詩薈》第一號〈餘墨〉中云：

擊鉢吟爲一種遊戲墨筆，選韻闡題，門捷爭工，藉資消遣，可偶爲之，而不可數，數則其詩必滑，一遇大題，不能結構，而今人偏好爲之，亦時會之使然歟！

又於《臺灣詩薈》第十九號〈餘墨〉中云：

二十年前，余曾以〈臺灣詩界革新論〉，登諸南報，則反對擊鉢之非詩也，……夫詩界何以革新，則余所反對者，爲擊鉢吟，擊鉢吟者一種之遊戲也，可偶爲之，而不可數，數則詩格自卑，雖工藻績，僅成土苴，故余謂作詩當於大處著筆，而後可歌可誦。

擊鉢吟是一種作詩比賽的文字遊戲，在中國有古老的歷史淵源，臺灣的詩社集會之時，社員經常以之競技爭勝，限題、限體、限韻、限時，較量高下，如此一來，作詩變成一種比賽遊戲，詩歌的真精神容易因之而蕩然無存，連先生針對此點，於《臺灣詩薈》第二十號〈餘墨〉中云：

今臺人士之所尚者，非詩乎？詩社之設，多以十數，詩會之開，日有所聞，而詩之真意義，知者尚少；夫詩者，最善最美之文學也，小之可以函養性情，大之可以轉移風化，其用神矣。而今之詩人知之乎，能不

詩為應酬頌揚之具乎？而詩之價值乃不失。

由此可見，連先生認為詩歌具有「涵養性情」、「轉移風化」的「神用」，一旦淪為比賽工具，則「詩之真意義」必然完全喪失，充其量只不過是「應酬頌揚」的物品而已；連先生為了證明此一看法，在《臺灣詩薈》第二號〈餘墨〉中，舉櫟社社長蔡啓運的詩作為例云：「櫟社前社長蔡啓運先生，風雅士也，耆年碩德，衆咸敬止；啓運固竹梅吟社員，慣作擊鉢吟詩，每出一題，輒成數首，以誘掖後學，及櫟社議刊同人集，諸友各有佳構，而啓運之詩大費選擇，以擊鉢吟外少制作也，然則欲學作詩，切不可專工此道，僅爭一日之短長也。」此話雖然有褒有貶，但斥責擊鉢吟詩之意至為明顯。

連雅堂先生既然對擊鉢吟頗有微詞，而擊鉢吟又是當時詩社活動常用的創作模式，那麼連先生有何改善意見呢？以下一則資料或許能提供我們答案：

近時，吟社每開大會，費款數百金，至者數百人，而僅作擊鉢吟二三唱以了之，真是可惜；余意欲開大會，先出宿題，遍徵吟詠，攜之蒞臨，屆時復出一題，以古人之詩為韻，各拈一字，任選一體，短篇巨製，聽客所為，當有佳章，以傳藝苑；昔冒辟疆宴天下名士水繪園，漁洋且作古律，欲以爭勝，固知多士濟濟，必能各聘（原作「聘」，誤）其才也。（見《臺灣詩薈》第二號〈餘墨〉）

依據上文可知，連先生認為預先出好「宿題」，或以「宿題」作為社課，如此則作者就有較多時間推敲吟哦，或許就能寫出佳作；至於社集之時的擊鉢吟，除了維持限題、限韻的成規外，體制則開放由社員自由選擇。又連先生對詩社活動中的「徵詩」與「社課」，也曾發表革新意見：

臺灣固多名勝，又饒古跡，而徵詩者竟舍近而圖遠，如桃葉渡也，莫愁湖也，題目雖佳，終難觀感，即如此次某社所徵之臥龍崗，更嫌太遠；夫詠懷古跡，必須身臨其地，而後能發幽情，不然我輩在此室中，而作弔古，雖極能事，終是死詩，而非活詩。羅山吟社亦以此期徵詩，而題目為吳鳳墓，夫吳鳳固羅山之人，而殺身成仁之男子也，緬懷先

哲，喚起國魂，詩人之分內事也，羅山諸君子而能以此提倡，則其對於民族前途，豈鮮少哉。（見《臺灣詩薈》第十號〈餘墨〉）

美友吟社近以社課「大夫松」五律，囑余評點，余以此題為秦皇登封之事，已屬枯窘，無處著想，若作七律，尚可敷衍，而五律則難下筆矣；五律詠物之佳者，少陵稱老手，然天河、初月、擣衣、歸燕諸作，大都借物寄託，隨題發揮，非如課題之以刻畫為工也；余意凡欲作詩，須先擇題，次選體，方有佳構，而詠物則以七律為宜，質之吟壇，以為然否？（見《臺灣詩薈》第十四號〈餘墨〉）

綜合以上兩則資料，連先生主張徵詩的題目必須「本土化」，他認為「桃葉渡、莫愁湖、臥龍崗」等「題目雖佳」，但終就不易引發作者思古之幽情；至於以「吳鳳墓」為題，對羅山（今嘉義）人而言，時近地親，容易產生「緬懷先哲，喚起國魂」的效果，即是好題；此點意見最值得肯定。至於「擇題」、「選體」方面，連先生亦認為兩者必須密切配合，否則作者「無處著想」，「難下筆矣」，由此可見連先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創作老手。

## 五、結語

經由前文之討論，我們對於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大概可以獲得以下幾項比較明顯的印象：

其一，連雅堂先生是一位富於民族意識的讀書人，他之所以熱中於詩社活動，主要是因為他身處日據時代，漢文化的延續，遭受極度摧殘，而詩社活動是被日本人允許的，連先生因而將詩社活動視為延續漢文化的重要手段，他本人不但積極鼓吹，而且還熱中參與。

其二，報人是連雅堂先生的重要身分之一，不論他在臺南、臺中、臺北，或是遠赴福建之時，都曾從事報業工作；而他在從事詩社活動之時，報業方面的專業長才，正是他最有力的支援，《臺灣詩薈》的刊行，就是

兩者結合的最佳成品。

其三，連雅堂先生對詩社的時代價值，雖然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但他對詩社的創作活動，卻有所保留，詩鐘是他認可的，對擊鉢吟則批評多而嘉許少，他認為詩社活動的最終目的在於「鼓舞讀書風氣」、「延續漢學命脈」，如果只為「學作詩」而參加詩社，則不可取；至於以詩社活動作為「應酬」或「獲取虛名」的手段，則更應該予以鄙棄。

## 雞鳴不已於風雨

### 一 在巨變中連雅堂所展現的書生本色

簡宗梧

政治大學中文系

多少年來，連雅堂的〈臺灣通史序〉都被選為高中高職國文的教材，所以為莘莘學子所熟讀。雅堂先生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說：

洪惟我祖先，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追懷先德，眷顧前途，若涉深淵，彌自儆惕。嗚呼！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此則不佞之幟也。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

所謂「凡我多士……，不佞之幟」云云，連雅堂顯然是以中國傳統之士自任。錢賓四先生曾說：「中國之士則自有統，即所謂道統。此誠中國民族生命文化傳統之獨有特色，為其他民族之所無。」<sup>1</sup> 中國知識分子的道統，黃俊傑有相當精闢的說明：

從中國歷史的經驗來看，中國知識份子自春秋戰國初次出現於歷史舞臺之時，即已發展了一種群體的自覺，而以文化傳統的承先與啓後自任。

<sup>1</sup> 錢穆〈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臺灣日報》，民國79年9月28日。